

# 图书馆情报学的实践转向：意义与问题<sup>\*</sup>

于良芝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天津 300071)

**摘要:** [目的/意图] 本文旨在介绍和反思国外图书馆情报学界(LIS)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以实践理论为基础的研究, 并对其未来发展提出建议。[方法/过程] 本研究主要建立在对实践理论及其LIS应用的阅读和阐释之上。[结果/结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实践理论已经在信息行为、信息素养、信息技术应用等LIS分支领域得到应用, 其解释力优势已经在多数研究中得到体现; 在信息行为领域, 它已经和其他社会文化视角一起, 成功弥补了认知视角的局限; 然而, 对实践理论不加反思和修正地应用, 也导致了将LIS研究客体过度扩大化和身体化的趋势。

**关键词:** 实践理论 实践转向 信息行为 信息素养

**分类号:** G250

DOI:10.31193/SSAPJ.ISSN.2096-6695.2020.01.01

## 0 引言

图书馆情报学(LIS)的实践转向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 在信息行为、信息素养、信息技术应用等分支领域出现的一种新研究趋势。这种研究以实践理论(practice theories)为基础, 将个体信息搜寻者、信息素养学习者、信息技术采纳者等视为社会实践的参与者, 强调社会实践对个人的信息需求、信息获取、信息利用、信息技术采纳、信息素养等方面的影响, 因而强调将上述现象置于特定的社会实践之中加以考察。这与之前主导LIS研究的认知视角非常不同: 认知视角将个人视为独立的认识主体, 强调个人头脑中的知识结构对当前信息需求及行为的介入和引导, 并以此解释个人的信息搜寻行为。正是出于对认识视角的反思, LIS研究者发现了实践理论在本学科的应用价值。

鉴于实践理论在整个社会学科领域产生的深远影响, LIS的实践转向无疑值得关注和推介;

<sup>\*</sup>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模式对信息分化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基于实践理论和信息经验中介作用的考察”(项目编号: 71974103)的系列成果之一。其缩略版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2019年学术年会上宣读, 感谢各位参会同仁的垂听和讨论。

[作者简介] 于良芝(ORCID: 000-003-0905-397X), 女, 博士生导师, 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信息不平等研究, Email: lzhyu@nankai.edu.cn。

然而,笔者自身的研究经历显示<sup>[1-2]</sup>,实践理论在 LIS 中的应用必须伴随着反思与修正。对 LIS 实践转向的推介与反思因而构成本文的双重目的。本文首先介绍实践理论的基本主张及其对实践概念的定义,随后回顾 LIS 实践转向中的主要研究,评价这一转向的意义和局限,最后对 LIS 实践转向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

## 1 实践理论及其实践概念

实践理论 (practice theories) 是一组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都比较接近的当代社会科学理论。这种理论的创建者和倡导者包括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 (Bourdieu)、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 (Giddens)、美国社会学家夏兹金 (Schatzki) 等。由于这些理论家的杰出贡献,实践理论已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应用最多的理论之一,以至很多学者认为,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世界社会科学经历了明显的实践转向。美国学者夏兹金这样定义这一转向:“当代思想中的一种一般趋势,它指通过、或借助于、或依据某些实践的概念来思考人类的生活、特别是社会生活的机构与运转”<sup>[3]</sup>。

正如上述三位经典理论家所代表的,“实践理论”其实包含了很多不同的具体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在基础概念和对社会现象的解释方面各有特色,但们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层次上,却共享很多见解和主张。这些共同见解和主张赋予各种实践理论明显的家族相似性,并形成了相对一致的实践进路 (practice-based approach)。在英文文献中,实践理论既存在复数表达 (practice theories),也存在单数表达 (practice theory);后者指的正是各种实践理论共享的进路。

实践理论共享的见解之一,是它们都将社会实践理解为全体社会成员或特定群体成员按其共享的意义、规则、行为方式等所从事的活动的总合。著名实践理论家夏兹金将实践定义为“具身化的、由物质中介着的人类活动组合”<sup>[3]</sup>;另一位学者 Orlikowski 将其定义为“由一个社群的成员参与的、由物质中介着的、处于特定情形中的、重复性的人类行动”<sup>[4]</sup>。如此定义的实践概念具有独特的内涵和外延,已经不同于日常用语中的“实践”概念(如与理论相对的实践概念)。从上述定义来看,实践理论赋予实践概念的独特内涵包括:(1)它指向群体活动的集合,如一个社会的婚嫁实践、一个地区的烹饪实践、一个企业的生产实践、一所大学的研究实践等;换言之,实践的主体是集体而不是个人。因此,诸如“张三李四的暑期实践”“XXX 的信息实践”等表达,不符合实践理论中的实践概念内涵。(2)任何实践都有  $N>1$  的个体参与者,他们理解彼此的行动,并因此赋予实践以共享的意义。(3)实践是被特定群体重复开展的活动的集合,具有历史性和空间性。(4)实践是以身体和工具为媒介的活动的集合,既受到身体和工具的使能,也受到它们的局限,并因此具有物质性。根据上述内涵,由任何一个可界定的群体持续开展并被其共享意义的活动,都构成实践。它可以是全体社会成员在某个方面的活动集合(如特定社会的礼物交换实践),也可以是特定组织内部特定活动的集合(如一个企业的生产实践、一所大学的教学实践等)。在实践进路的研究中,各种实践都可能成为研究客体。

实践理论共享的见解之二,是突出实践在社会生活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中心性,认为实践决

定了社会生活的样态, 造就了社会实在 (social reality), 因而构成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客体。这与以往的社会科学理论显著不同。以往理论在解释社会现象的性质及其根源时, 通常或者突出社会结构, 或者突出个人行动。前者认为, 是社会的整体结构因素 (如社会制度、劳动分工、阶级等) 决定了社会生活的样式: 个人出生于一个结构化的社会, 便受到各种结构因素的决定, 按这些因素的规则行动, 从而形成社会生活。后者认为, 是个人行动即主体能动性决定社会生活的样式: 个人出生在特定的环境之中, 就成为那个环境之中的行动者, 在自身与环境的交互过程中逐渐形成对世界的观念, 在此观念引导下行动, 由此形成社会生活。在注重结构的理论视野下, 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将整个社会或其特定侧面作为研究对象, 揭示它如何作用于个人行动, 成就社会生活, 决定社会实在。在注重个体能动性的理论视野下, 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将行动者作为研究对象, 揭示他们如何形成对世界的认知, 如何行动, 如何通过社会交往形成社会生活。实践理论试图嫁接和超越上述理论进路, 认为社会实在既非源自整体社会结构, 也非源自个体行动, 而是形成于群体的实践; 认为二元的两端 (结构 vs 主体能动性、客观 vs 主观、社会 vs 个人) 在实践中交互, 共同生产和再生产实践。与此相适应, 社会科学的研究焦点和分析单元既不是整个社会及其结构要素, 也不是个人及其行动, 而是实践<sup>[5]</sup>。需要指出的是, 这并不意味着实践进路不再关注个人及其活动, 而是意味着它在考察个体时, 总是将其视作群体的成员而非独立自主的个体。

实践理论共享的见解之三, 是它们都认为, 处于特定社会实践中的个体一方面受到群体所共享的意义、规则、行为方式等的塑造, 并以群体认同的方式思考、表达、行事; 另一方面又通过自身所思、所言、所行延续该群体的实践。因此, 个人行动与社会实践之间不是简单的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 而是一种相互成就的关系。例如, 图书馆员在其职业活动中必须按职业认同的方式表达意见和开展行动, 而所有图书馆员的所言所行维持了图书馆职业实践的存续。

与其他社会理论相比, 实践理论共享的见解之四, 是它们都格外关注那些经过实践长期内化、可由身体直接行使 (即无需头脑解析) 的个人知识, 如语言行为中的语法知识、汽车驾驶中的操作知识、运动项目中的动作要领、人际交往中的社会规范等。布迪厄的惯习概念 (habitus)、吉登斯的实践意识概念 (practical consciousness) 和夏兹金的实践领悟概念 (practical understanding) 主要指向这类知识。

## 2 LIS 研究中的“实践”与实践理论

在实践理论对世界社会科学产生广泛影响之时, LIS 领域也出现了两大以“实践”命名的发展趋势: 一是在信息行为研究领域, 一些不满认知进路的学者开始放弃认知色彩浓厚的“信息行为”概念, 采用“信息实践”概念取而代之, 由此形成了一套信息行为研究的新话语体系; 二是在信息行为、信息素养、信息技术应用领域, 一些学者开始在其研究中自觉运用实践理论, 由此形成了一种基于实践理论的新研究进路。这两大趋势分别发端于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 并在进入 21 世纪后日趋明显。其中, 实践理论的自觉应用已被不少学者视为图书馆情报学的实践转向<sup>[6-8]</sup>。

## 2.1 从“信息行为”到“信息实践”的研究视角和话语转换

LIS对信息用户的研究兴趣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研究生院<sup>[9]</sup>。这些早期的用户研究主要关注用户对图书馆服务的利用及对不同信息源(图书、报纸)的选择。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对这类研究进行批判反思的基础上,兴起了一种称作信息行为的研究。早期信息行为研究主要聚焦信息搜寻行为(后来才扩展到其他行为,如信息偶遇、分享等),考察信息搜寻行为的发生及发展过程。这时期出现的众多信息行为模型(如Belkin<sup>[10]</sup>、Kuhlthau<sup>[11]</sup>的模型)都以特定情形下的信息搜寻行为为分析单元(从需求的感知到需求的满足/终止为一单元),从个人的认知状态入手,解释信息搜寻行为的发生发展。由此形成的典型解释就是:当个人面临需要解决的问题而现有知识结构不足时,就需要从外部获取信息,弥补自身知识欠缺;信息的获取和利用引发原有知识结构的改变、需求的更新和信息搜寻策略的调整,产生新的信息获取和利用,直至问题得到解决。这样的解释将个人的“认知状态—信息需求—信息搜寻—信息利用—新认知状态”视作独立而封闭的循环,排除了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这被称为信息行为研究的认知进路<sup>[12]</sup>。

即使是在认知进路最为流行的20世纪80年代,已有学者注意到它忽略社会文化因素的局限,并尝试通过其他进路进行弥补。这类尝试始于美国学者Chatman<sup>[13-17]</sup>。Chatman先后采用社会网络分析、社会建构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等社会学理论,将个人置于其社会交往或社会文化环境中,考察其信息行为。20世纪90年代,她在总结上述考察结果的基础上形成了小世界信息行为理论,系统阐释内化于个人意识中的社会规范、世界观、局内—局外人意识等文化因素对信息行为的影响。除了Chatman,其他关注社会文化因素的信息行为研究学者还包括美国学者Taylor<sup>[18]</sup>、Fisher(曾用名Pettigrew)<sup>[19]</sup>以及北欧学者Savolainen<sup>[20]</sup>等。Taylor关注由社会分工形成的职业/学科共同体内的信息行为,Savolainen关注日常生活情境下的信息行为,Fisher则关注人们因特定目的(如理发、修脚)而相聚时,临时形成的社会交往场所的信息行为(Fisher称这种临时社会交往场所为信息场,information ground)。Pettigrew等在梳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信息行为研究时,将这类研究称作信息行为研究的社会进路(social approaches)<sup>[12]</sup>。

进入21世纪后,追随社会进路的研究者大都认为,“信息行为”概念本身带有浓厚的认知视角色彩,与社会文化视角不相兼容。为了突出两种视角的差异,他们开始使用“信息实践”概念取代信息行为概念。Savolainen这样定义信息实践:“信息实践可以被理解为一组由社会和文化确立的,在诸如电视、报纸、互联网等不同信息源中确认、搜寻、利用和分享信息的方式”<sup>[6]</sup>。由此可见,“信息实践”相关研究其实就是社会文化视角的信息行为研究。

## 2.2 实践理论的自觉运用——LIS的实践转向

随着社会文化视角的兴起,LIS学者开始更加主动地引入相应的社会科学理论,其中就包括实践理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Savolainen<sup>[20]</sup>引入布迪厄的惯习理论(布迪厄实践理论的组成部分)考察日常生活情境下的信息搜寻行为,提出了解释日常生活情境下信息搜寻行为的两个重要概念:生活方式和生活能力;其中生活方式指人们在生活中对各类事物(如工作、家庭、个人爱好)优先性的排序,“生活能力”指个人在生活中维持其生活方式(即事物优先次序)的常规策略,二者皆由个人可支配的物质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以及个人价值观、态度及生活

状况所决定, 又转而决定个人在问题情境下的信息搜寻行为。在 Savolainen 引入布迪厄理论的同时, Rosenbaum<sup>[21]</sup> 引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考察企业管理者的信息利用环境, 由此发展了 Taylor 提出的信息利用环境要素, 在 Taylor 四要素(人群、问题、问题的解决方案、工作场景)的基础上, 增加了资源和规则两个要素。进入 21 世纪后, 更多学者借鉴实践理论考察信息行为、信息素养、信息技术利用。例如, Veinot<sup>[22]</sup> 借鉴实践理论考察地下电站监测员的信息实践、Rivera and Cox<sup>[8]</sup> 考察高等教育实践中的管理系统、Lloyd<sup>[23-25]</sup> 考察紧急救护、消防实践中的信息素养。上述研究, 无论关乎信息行为还是其他 LIS 问题, 都强调个人作为社会实践参与者的角色, 认为那些把个人行动组织为群体实践的要素(如夏兹金提出的领悟、规则、目的情感结构)同样规定着个人的信息行为特征。

与其他社会文化研究进路相比, 实践理论的自觉应用赋予相关研究以显著创新。此前的信息实践研究主要强调从社会文化视角审视信息行为, 强调信息行为特征的社会文化根源; 其基本进路就是以个人为分析单元, 观察他们在日常生活或工作中的信息搜寻、共享、利用等行为, 观察这些行为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关系。基于实践理论的研究将宽泛的社会文化因素具体化为特定的社会实践, 如一个地区或一所学校的教育实践, 一个行业的职业实践等, 考察该实践中嵌入的信息行为; 其基本进路是以实践为分析单元, 从实践理论所关注的各要素入手, 考察实践对个人信息行为的塑造。由此可见, 虽然同样反对认知视角的化约倾向, 实践理论之外的信息实践研究聚焦社会文化因素在个人信息行为上的投射, 基于实践理论的研究则聚焦实践对个人信息行为的嵌入。正因为如此, 英国学者 Cox<sup>[26]</sup> 认为, 实践理论引导下的信息行为研究关注的不是信息实践(information practices), 而是实践中的信息(information in practices)。Savolainen 等学者所说的 LIS 实践转向主要指实践理论指导下的研究趋向。

### 3 LIS 实践转向的意义

如前所述, 实践理论通过突出实践在社会生活及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中心性, 力图弥补二元对立的社会科学理论的解释力局限, 为那些既不满结构决定论也不满个体行动论的学者提供一条中间道路。得益于布迪厄、吉登斯、夏兹金等实践理论家的卓越贡献, 实践理论内部已经形成了多种系统学说, 为选择实践进路的各领域学者提供了丰富的概念体系(如布迪厄的惯习、资本、场域; 吉登斯的规则、资源、实践意识; 夏兹金的规则、领悟、目的情感结构、场域本体论等)和理论框架。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它们在各学科领域的传播与应用,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社会科学界对这一进路的肯定。

实践理论在 LIS 领域的运用也显示出它们对 LIS 问题的独特解释力和洞察力。首先, 实践理论引导 LIS 学者在信息行为研究中将个人行为视为更大实践的组成部分, 即视二者为嵌主(embedding)与嵌客(embedded)的关系, 关注嵌主实践对嵌客信息行为的使能和限制。与其他社会文化进路相比, 实践进路也关注社会文化的影响, 但由于聚焦特定实践, 并以实践为分析单元, 这就为考察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提供了更具体、更可操作的范围。

其次, 实践理论还可引导 LIS 领域的信息贫困和信息不平等研究者对各种抑制信息获取的实

践因素或特征进行反思,担当起从 LIS 角度对实践本身的批判,促进实践对信息的获取和利用。例如通过对一个国家、地区或教育机构的教育实践的审视,或通过对不同国家教育实践的比较,揭示抑制或鼓励学生信息获取的教育实践特征。本文作者领导的最新研究<sup>[2]</sup>显示,个人在不同人生阶段参与的社会实践,通过嵌入一定密度的信息活动、采用特定信息源和技术作为工具、合法化特定的信息利用方式、关联不同的信息环境等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其信息主体角色,决定其在信息分化中的位置。然而,这样的塑造往往不易被实践参与者所觉察。这是因为投身特定实践的个人,一旦按群体共享的意义和方式从事活动,就会对这些活动习以为常,无论它们是导致信息富裕的还是信息贫困。实践理论恰恰可以为反思实践本身的视野局限提供概念工具。布迪厄对现代教育系统(或教育实践)如何再生产社会不平等的反思就体现了实践理论的批判反思价值<sup>[27]</sup>。

再次,实践理论引导 LIS 学者将信息、信息服务、信息技术视为实践的工具,强调信息服务和技术一方面要合乎实践的特点和规律,成为实践的“合用”工具,另一方面又要求实践参与者按自己的功能和结构开展活动,并因此成为改进实践的力量。这意味着,LIS 社区在研发新的服务和技术时(如阅读推广项目),必须考虑嵌主实践的规律。Rivera and Cox<sup>[8]</sup>的研究显示,其案例机构的信息技术更新项目之所以以失败而告终,就是因为它过度偏离该机构已有的管理实践,未能成为实践的“合用”工具。

#### 4 LIS 实践转向的问题反思

实践理论主要产生于社会学领域。尽管这些理论都具有跨学科应用价值,但它们的核心旨趣都在于解释社会学问题,特别是社会生活如何可能的问题,即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意志独立的个人如何能够不费力气地活出“社会生活”来。按布迪厄的表述,就是人们何以能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经思量地行出适当行动;按夏兹金的表述,就是个人何以保持自身行动与实践之间的同调(homology)。在回答这类问题时,实践理论特别突出具身化知识(embodied knowledge)的作用。如前所述,所谓具身化知识就是个人在长期实践中获得的,已融入躯体之内,可由身体直接行使的知识。典型的具身化知识包括我们拥有的母语知识、运动知识、驾驶知识、礼仪规范知识、行业操作知识等。这类知识因为无需经过记忆调取、头脑解析、躯体传导的过程,因而是保证个人顺畅参与实践活动(与实践保持同调)的重要机制。布迪厄的惯习概念、吉登斯的实践意识概念、夏兹金的实践领悟概念都聚焦具身化知识,足见它在实践理论中的地位。

与突出具身化知识相适应,实践理论十分强调身体在实践中的作用。在实践理论看来,身体不仅是行动的媒介、具身化知识的载体,同时也是其他意义的载体。例如,在布迪厄的理论中,形体与身姿都叙述着个人的阶层归属及成长史。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体本身就提供着叙事。夏兹金在评价身体的作用时指出:“实践[领悟]是一组身体能力……由于社会秩序取决于以具身化[领悟]为基础的实践,所以社会秩序直接植根于人的身体”<sup>[3]</sup>。

对具身化知识的强调使得实践理论在客观上相对忽略文本化知识;对身体的强调也使得实践理论在客观上相对忽略头脑的作用。实践理论关注具身化知识甚于文本化知识,关注身体甚

于头脑的倾向, 导致它们相对欠缺描述和阐释后者的概念及命题。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很少谈到文本化知识(除了在符合权力的语境下), 吉登斯的理论虽然提出了话语意识概念(discursive consciousness, 指可以通过语言加以表述和交流的知识), 但其地位远远低于实践意识概念, 它几乎是吉登斯理论的一个孤立概念, 没有与之相关的命题, 因而没有多少解释力。对于始终聚焦文本化知识的图书馆情报学而言, 实践理论的上述倾向表明, 二者的核心旨趣之间存在十分显著的距离, 实践理论的概念工具不完全适用于图书馆情报学问题。意识不到这一距离, 不加反思和修正地追随其他领域的实践转向, 很可能导致图书馆情报学转向一条背离本学科核心问题的道路。

遗憾的是, 截至目前的图书馆情报学似乎正是在缺乏反思和修正的情况下, 匆忙登上了社会科学实践转向的列车。LIS 领域基于实践理论的研究, 无论是针对信息行为的, 还是针对信息素养的, 似乎都继承了实践理论关注具身化知识甚于文本化知识、关注身体甚于头脑的倾向, 已经显出过度强调“身体信息”的迹象。例如, Lloyd 在其基于实践理论的信息素养研究中指出, 信息素养不仅仅是文本实践, 更是一种以交往为表现形式的社会实践和以具身化行动为表现形式的身体实践<sup>[28]</sup>。“行动的身体提供自己的叙事, 这种叙事只能在实践当中经由观察而获取”<sup>[29]</sup>。2018 年, 一批受实践理论和现象学影响的 LIS 学者, 在《图书馆趋势》(Library Trends) 季刊上连续出版两期专刊, 均以身体为主题, 呼吁图书馆情报学加强对身体的研究。在上述研究的影响和高调呼吁下, 突出身体的信息价值已然成为国外图书馆情报学研究的新动向, 以至加拿大学者 Hartel 不无揶揄地将其称为图书馆情报学的“身体转向”<sup>[7]</sup>。

一旦将身体作为信息载体、信息源、信息传递手段、甚至信息本身(即意义的载体)而加以突出, 接着就必然将身体与外界的一切交互都视作信息实践, 将“阅读”和“阐释”身体的能力视作信息素养的组成部分。这不仅在客观上导致 LIS 偏离文本化知识, 而且势必带来“信息实践”和“信息素养”外延的扩大化, 导致信息实践与其他实践、信息素养与职业素养界限的模糊。Veinot 在有关地下电站监测人员信息行为的研究中, 就将整个监测活动解读为信息实践<sup>[22]</sup>。这样的扩大化究竟会带来职业竞争力的增强还是削弱, 确实值得商榷。试想, 如果特定职业的信息素养与其职业素养高度雷同, 信息素养的培训是否还能赢得独立的资源与时间投入? 正如 Hartel 指出的, 并非所有转向都有益于学科发展, 她和社会认识论哲学家 Steve Fuller 都认为, 强调身体作用的图书馆情报学转向背离自己的初衷太远了<sup>[7,30]</sup>。

## 5 结语: LIS 实践转向建议

如上述所,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 世界社会科学领域兴起了“依据某些实践的概念来思考人类的生活特别是社会生活的机构与运转”的研究<sup>[3]</sup>, 这被称作社会科学的实践转向。实践理论强调实践在社会生活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中心性, 强调结构与主体能动性在实践的生产和再生产中的交互作用, 突出身体、物质工具、具身化知识和共享意义对于实践的重要性。上述进路及相关概念体系已经被很多社会科学领域证明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洞察力, 适用于很多社会现象的考察。然而, 实践进路的某些特点, 特别是它对身体及具身化知识的强调, 如果不加反思和修正地在 LIS 研究中予以采纳, 极有可能导致 LIS 偏离其基本使命。为了避免本领域的实践转向走上

Hartel 和 Fuller 等所担心的歧途,未来相关研究可能需要做出若干调整:

首先,尝试在实践理论框架中纳入头脑、知识结构等认知进路的合理成分,即在保留实践理论对社会文化敏感性的前提下,纳入认知进路的要素。而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就是在实践理论体系中给予嵌客信息活动(embedded information activity)以应有的地位,然后通过阐释嵌主实践、嵌客信息活动、心智状态或知识结构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充实现有实践理论。经过如此修正的实践理论,不仅更可能适合图书馆情报学的需要,也更可能利用本学科优势,创新和发展一般实践理论。本文作者领导的最新研究证明,这种修正和发展是可行的<sup>[2]</sup>。

其次,在明确界定信息行动(information action)、信息活动(information activity)、信息行为(information behavior)、信息技术、信息素养等本学科概念的前提下,借鉴和利用实践理论。这些概念所指向的现象或事物,构成基于实践理论的研究的观察对象。而相关研究只有先厘清自己的观察对象,才能在嵌主实践中对其实施定位和分离,然后将其置于嵌主实践的情境下,对其实施观察和分析;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图书馆情报学在实践转向中迷失自身目标。然而,要界定以信息为前缀的概念,LIS 研究者就不得不首先界定数据、信息、知识等更基础概念。

再次,进一步聚焦嵌主实践中的嵌客信息活动,并将前者作为后者的情境;按 Cox 的表述,就是关注社会实践中的信息(information in social practices)<sup>[26]</sup>,而不是脱离嵌主的“信息实践”(information practices)。从实践理论观之,社会实践的目标多种多样,包括生产性的、社会性的、政治性的、情感性的等,但绝大多数实践都需要不同程度的信息支撑,因而会不同程度地嵌入信息活动;比较而言,很少有社会实践的目标是纯信息性的,即单纯由独立的、不服务于其他实践的信息活动所构成。主张 Cox 式的研究焦点就是强调信息活动的嵌入性,这是实践理论的内在逻辑所要求的;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实践理论的优势。

以实践理论的自觉运用为标志,部分图书馆情报学研究已加入社会科学实践转向的行列。这些研究显示,实践理论对丰富图书馆情报学理论基础、提高相关研究对本领域现象的解释力,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但根据本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有理由相信,一个经图书馆情报学修正的、LIS 版实践理论,无论对一般实践理论,还是对图书馆情报学相关研究,都将产生更大价值。

## 【参考文献】

[1] YU L. Towards structure-agency integrative theories for information access disparity: Lessons from within and beyond LIS[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19, 75(3): 458-477.

[2] YU L., ZHOU W., WANG J. A structure-agency integrative framework for information access disparity: Rediscovery of practice in dividing Society's information rich and poor[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DOI 10.1108/JD-05-2019-0097.

[3] [美] 夏兹金等(编著). 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M]. 柯文, 石城译.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0.

[4] ORLIKOWSKI W.J. Knowing in practice: enacting a collective capability in distributed organizing[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2, 13(3): 249-273.

[5] GIDDENS A.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4.

[6] SAVOLAINEN R. *Everyday Information Practices: A Social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M].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2008.

[ 7 ] Hartel J. The case against information and the body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 J ]. *Library Trends*, 2018, 66 (4): 585-588.

[ 8 ] RIVERA G., COX A. An evaluation of the practice based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the adoption and use of information systems [ J ].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14, 70 (5): 878-901.

[ 9 ] WILSON T.D. Fifty years of information behavior research [ J ].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0, 36 (3): 28-34.

[ 10 ] BELKIN, N.J., ODDY R.N., BROOKS H.M. ASK for information retrieval. Parts I [ J ].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1982, 38(2): 61-71.

[ 11 ] KUHALTHAU C. C. Inside the search process: information seeking from the user ' s perspective [ J ].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1991, 42(5): 361-371.

[ 12 ] PETTIGREW K. E., FIDEL R., BRUCE H. Conceptual frameworks in information behavior [ J ]. *Annual Review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1, 35(1): 43-78.

[ 13 ] CHATMAN E.A. Information, mass media use and the working poor [ J ].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1985, 7(2): 97-113.

[ 14 ] CHATMAN E.A. The information world of low-skilled workers [ J ].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1987, 9 (4): 265-283.

[ 15 ] CHATMAN E.A. Life in a small world: applicability of gratification theory to information-seeking behavior [ J ].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1991, 42(6): 438-449.

[ 16 ] CHATMAN E.A. The impoverished life-world of outsiders [ J ].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1996, 47(3): 193-206.

[ 17 ] CHATMAN E.A. A theory of life in the round [ J ].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1999, 50 (3): 207-217.

[ 18 ] TAYLOR R.S. Information use environments [ M ]. In Dervin B. and Voight M.J. (eds). *Progress in Communication Sciences*, 1991, pp. 217-255. Norwood, NJ: Ablex.

[ 19 ] PETTIGREW K.E. Waiting for chiropody: contextual results from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the information behaviour among attendees at community clinic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 November 1999, 35(6):801-817.

[ 20 ] SAVOLAINEN R. Everyday life information seeking: Approaching information seeking in the context of "way of life" [ J ].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1995, 17(3): 259-294.

[ 21 ] ROSENBAUM H. Structure and action: towards a new concept of the information use environment [ J ]. *Proceedings of the 59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1996, 33 (1): 152-157.

[ 22 ] VEINOT T.C. The eyes of the power company: workplace information practices of a vault inspector [ J ]. *The Library Quarterly: Information, Community, Policy*, 2007, 77(2): 157-179.

[ 23 ] LLOYD A. Information literacy landscapes: an emerging picture [ J ].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06, 62(5): 570-583.

[ 24 ] LLOYD A. Information practice: information experiences of ambulance officers in training and on-road practice [ J ].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09, 65(3): 396-419.

[ 25 ] LLOYD A. Fram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as information practice: site ontology and practice theory [ J ].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10, 66(2): 245-258.

[ 26 ] COX, A.M. An exploration of the practice approach and its place in information science [ J ].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2012, 38 (12): 176-188.

[ 27 ] BOURDIEU, P.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 M ]. In Brown R. (Ed.), Knowledge, Educ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pp. 71–112. London: Tavistock, 1973.

[ 28 ] LLOYD A. Information literacy as a socially enacted practice: Sensitising themes for an emerging perspective of people-in-practice [ J ].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12, 68 (6): 772–783.

[ 29 ] LLOYD A. Fram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as information practice: site ontology and practice theory [ J ].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10, 66 (2): 245–258.

[ 30 ] FULLER S. Afterword: Does the focus on embodied information broaden or narrow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Library Trends, 2018, 66(4): 589–594.

## The Practice-Turn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Significance and Problems

YU Liangzhi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Business School,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

---

**Abstract:** [ **Purpose/significance** ] This paper aims to introduce and critique practice theory based research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broad since the 1990s and reflects on its future development. [ **Method/process** ]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rea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major practice theori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 **Result/conclusion** ] This paper shows that since the 1990s, studies in information behavior,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ICT use have frequently adopted cross-disciplinary practice theories and have demonstrated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se theories for LIS phenomena. In information behavior research, for instance, related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practice-based research is adept at unveiling the impact of sociocultural factors on human information behaviour, in contrast with the neglect of such impact by the cognitive perspective. However, this study also shows that uncritically adopting practice theories has le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towards over emphasis on bodies and embodied knowledge at the cost of the mind and propositional knowledge.

**Keywords:** Practice theories; the Practice-turn; Information behavior; Information literacy

---

( 本文责编: 孔青青 )